

《战争与和平》中的帝国神话集体记忆

张 嵘

(辽宁大学, 沈阳 110036)

提 要: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表达形式, 在集体记忆的形成、传承与重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学作品, 个体能够体验并共享集体记忆, 从而获得认同、理解与共鸣。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在推动集体记忆的演化与重构中扮演关键角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在塑造俄国人自我形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叙述核心集中于对祖国的关注及民族命运的思考。小说以外敌入侵与俄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为主要事件与主题, 不仅真实再现了战争场景与历史事件, 同时通过补充性的想象满足了民族身份构建的需求。这种双重叙述策略深化了集体记忆的传播与共鸣, 并谱写了俄罗斯帝国的政治神话。这一特质正是《战争与和平》被誉为俄罗斯伟大史诗小说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 集体记忆; 《战争与和平》; 帝国神话; 博罗季诺战役

中图分类号: I512.06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战争与和平》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 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小说以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俄罗斯社会为历史背景, 通过丰富的人物刻画和复杂的情节结构, 深刻展现了战争对个人命运与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战争与和平》因其广阔的历史视野与深刻的人性洞察而备受赞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鲜明生动, 战争场景描写精彩逼真, 同时对生活、爱情与人性等主题进行了深刻反思。这些特点不仅奠定了其作为文学经典的地位, 也激发了广泛的学术讨论与研究。《战争与和平》所凝聚的文学价值与文化意义, 不仅体现在文学评论与学术研究之中, 更体现在广大读者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中。

19 世纪 60 年代, 俄罗斯帝国经历了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变革。1861 年, 农奴制被废除, 标志着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 1860 年, 帝国完成了对高加索地区最后一个独立公国斯瓦尼齐亚的兼并, 将该地区完全纳入其统治范围。1864 年, 波兰起义遭到镇压, 波兰王国失去自治地位, 被降格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省份。在外交与军事方面, 尽管俄国在 1853—1856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到失败, 其后却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收复了此前割让的领土。从 1856 年开始, 俄罗斯帝国进一步向清朝西北扩张, 通过签订《天津条约》《璦琿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割占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及中国西北部巴尔喀什湖周边约 140 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这一时期, 伴随巧取豪夺的“战争果实”和国内经济的逐步复苏, 俄国社会的自信心显著增强。这种历史背景在文学领域表现为对体现民族自豪感和“俄化”意识的作品的强烈需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于 1863—1869 年创作完成, 作品既满足了俄国社会对辉煌帝国形象的心理诉求, 又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巩固了民族认同与历史记忆。

托尔斯泰将小说的时间背景设定在 1812 年俄国的卫国战争期间。战争作为一种艺术资源，无论胜利或失败，其在增强国家凝聚力方面的意义都极为重要。胜利者通过对战争的反复叙述，强化国家优越感；而失败者则借助战争失败所激发的愤怒与悲哀，动员民众团结在为国家牺牲的烈士纪念碑之下。尤其当战争的对手是法国时，这种叙事的意义更为显著。在当时的俄国上层社会，法国文化对贵族生活影响深远。例如，小说中的博尔孔斯基伯爵在起床时仍习惯于朝脸上扑粉，贵族们用法语交流并举办法式舞会。由此可见，打败这样一个被视为“老师”和“上帝”（托尔斯泰 2014：611）的对手，成为证明俄国在欧洲地位的最佳方式。而作为对手的“波拿巴是不可战胜的，整个欧洲都对付不了他”（托尔斯泰 2014：5）。正是在“奥地利背叛我们，英国人满脑子生意经，普鲁士宣布中立”的情况下，俄国被叙述为“拯救整个欧洲的救星”（托尔斯泰 2014：5）。

尽管小说中以部分历史事实为依据，但其叙述方式往往给读者一种错觉，即俄国似乎独自击败了法国，并为保卫整个欧洲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一叙事与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的观点不谋而合：“为了遏制亚洲人的这种入侵，我们的民族耗尽了自己的力量，打退了一批人……从鞑靼的侵扰下拯救了欧洲文化，这样，我们就成了欧洲的大后方，保护了欧洲的文明”。（Ключевский 1906：508）通过有意识地将虚构想象与真实历史相结合，小说实现了特定的历史叙事建构，使帝国神话超越史实并留存在读者记忆中，从而构建了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话语权。在俄国人自我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小说叙述的核心集中于对祖国的深切关注和对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其主要事件和主题围绕外敌入侵以及俄国人民的英勇抵抗展开。作者不仅在小说中真实再现了战争场景与历史事件，同时通过虚构与补充性的想象满足了民族身份塑造的需求。这一叙事策略进一步深化了集体记忆的传递与共鸣，并谱写了俄罗斯帝国的政治神话。这正是《战争与和平》被誉为俄罗斯伟大史诗小说的主要原因之一。

2 对俄国人民跨阶级团结图景的呈现

在宏大的战争背景下，托尔斯泰着重描写了罗斯托夫、瓦西里公爵、保尔康斯基和别祖霍夫四个贵族家族的日常生活。然而，在描绘这些主要人物的同时，作者也投入了大量笔墨刻画战争中中下阶层小人物的命运。这些描写的目的不仅在于展现战争的残酷，更在于赞颂小人物的勇敢、坚韧的生命力以及他们对祖国的忠诚。通过这些角色，托尔斯泰突出了一种超越阶级的和谐关系：小人物在与上层贵族的互动中表现出质朴的真诚与协作精神，这种品质成为支撑民族精神的重要力量，同时也使作品具有更广泛的社会视野。

炮兵军官土申上尉作战勇敢，在未接到作战命令时果断下令轰击正在向村庄推进的法国军队以控制局势。在撤退时被遗忘的情况下，他凭借四门火炮与法国的十门火炮展开激烈对抗，以巨大的牺牲为俄军主力赢得了撤退的时间，战斗过程中，土申又充满同情地救助了受伤的尼古拉。然而，战斗结束后，因为弄丢了两门大炮而受到长官批评，他选择保持沉默，不愿牵连其他军官，并未解释火炮遗失的真正原因——由于缺乏掩护部队，他不得不单独坚持作战，在激烈的交火中两门火炮被毁。托尔斯泰这里安排了细腻的描写，土申为大炮命名为“马特维夫娜”，作者从细节中展现了土申对职责的深刻认同和作为军官的尊严感：这样的军人怎能容忍自己活着却丢失火炮的耻辱？关键时刻，安德烈·保尔康斯基站出来解释了实际情况，为土申免去了处罚。土申感激之情难以言表，热泪盈眶地称安德烈为“好朋友”。这一情节不仅展现了土申的人性深度与责任感，也通过安德烈的介入突出了小说对军人间跨阶级的友谊与信任的刻画。

骑兵连长杰尼索夫大尉是另一位生动的小人物，他与尼古拉·罗斯托夫同在保罗格勒骠骑兵团服役。他“黑色胡子蓬松，狮子鼻，身材矮小结实”（托尔斯泰 2014：162），骑在马上像鸟儿饮水那样仰起须发蓬乱的头，平时爱喝两瓶，有着骠骑兵的勇猛无畏和骄傲。杰

尼索夫与尼古拉交情深厚，曾与其一起回家休假，并曾向尼古拉的妹妹娜塔莎求婚。在巴腾施泰附近驻扎时，杰尼索夫因不忍看到骑兵断粮致使身体浮肿而擅自劫夺步兵的粮草车。此举触犯军法，被军法委员会审判。尼古拉为帮助杰尼索夫四处奔走，最终将呈文亲自递交给了皇帝。然而，皇帝却以无法凌驾于法律之上为由拒绝干预，未能挽回杰尼索夫的处境。

他们是俄国士兵的典型代表，凝聚了俄国中下层人物的精神特质：勇敢、智慧、忠诚于祖国，同时又带有谦逊和笨拙的特点，令人怜悯却又可敬。这些鲜活的士兵形象如同浮雕一般，被刻画在反法战争这一伟大的历史画卷上。托尔斯泰的描写缓和了战争中侵略性的硝烟气息，为战争增添了人情味，向读者传递出俄国人为了和平而甘愿牺牲的正义形象。此外，土申与安德烈、杰尼索夫与尼古拉之间的“跨阶”友情进一步模糊了阶层冲突，构建了各阶层人民齐心协力、携手抗敌的大团结图景，为作品注入了理想化的社会和谐愿景。

另一个展现团结的图景出现在女主角娜塔莎·罗斯托娃打猎时与“大叔”跳舞的场景。这一场景与俄国贵族舞会的奢华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娜塔莎和其他贵族出身的女士们会跳俄国传统舞蹈，尼古拉在军队中会跳俄国顿足舞，但在贵族正式舞会上，流行的却是如华尔兹、波兰玛祖卡舞、苏格兰舞以及法国的科季里昂舞等西方舞种。娜塔莎首次参加的盛大舞会是在1810年新年前夜的迎新舞会，沙皇、外交使团和达官显贵悉数出席。娜塔莎一家都为此舞会做了精心准备，从服饰到细节都反复讨论，“伯爵夫人应当穿紫红色丝绒连衣裙，娜塔莎和宋尼亚要着粉红色绸衬裙，外加白纱连衣裙，腰带上佩玫瑰花。头发应梳成希腊式”（托尔斯泰 2014：474）。“腿、臂和脖子、耳朵都按照舞会要求精心洗过，喷了香水，搽了粉；双脚上穿上了透花长袜和有花结的白缎舞鞋……”（托尔斯泰 2014：474）贵族舞会作为小说中重要的功能场之一，不仅是许多关键情节的发生地，同时通过细节描写展现了贵族生活的奢靡与其精神世界的特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娜塔莎和尼古拉在打猎途中，接受一位远亲地主的邀请前往农庄做客的情景：女仆赤着脚，起居室中摆放着一张破旧的沙发，地上铺着陈旧的地毯，仆人举止略显粗俗，却营造出一种自然、轻松的氛围。在这次做客中，托尔斯泰让娜塔莎毫无拘束地开怀大笑，并随着俄式三弦琴的旋律跳起俄国民间舞。托尔斯泰写道：“这位由法籍家庭女教师培养出来的伯爵小姐，是在何时何地吸收了法国披巾舞所缺乏的俄国风味和俄国气派的？”（托尔斯泰 2014：573）此时的娜塔莎“完全成为了另一个人”（托尔斯泰 2014：573），她身上自然流露出深植于俄国文化中的特质，展现了独特的“俄罗斯韵味”。贵族与其他阶层在兴趣与文化上虽存在差异，但在这一场景中，这些阶层和文化差异被巧妙地抹去。两个背景迥异的人物之间的互动象征性地呈现出俄国理想化的帝国形象。这种描写遮蔽了农奴经济的落后与农奴生活的窘迫，而是通过浪漫化的文字，向读者展现出一种团结的“俄国神话”，这一场景不仅突显了民族认同感，也将俄国的历史文化包装为令人向往的乌托邦式叙事。

从皮埃尔·别祖霍夫伯爵经历了被俘以及屠杀后侥幸存活的情节中，托尔斯泰展现了中下阶级小人物人性中的善意与希望。在被俘的旅途中，皮埃尔遇到了同是俘虏的农民普拉东，后者尽管身处困境，在看到“老爷”受尽艰辛后依然产生惻隐之心。当普拉东亲切地问道：“您吃过不少苦吧，老爷？”（托尔斯泰 2014：1071）这一句简单而诚挚的问候拉近了两个阶层之间的距离。普拉东将自己的土豆让给饥饿的皮埃尔食用，为他修补鞋子，甚至因得知皮埃尔没有父母而深表同情。这种无私而质朴的善良让皮埃尔重新燃起了对世界的希望。皮埃尔意识到，尽管战争摧毁了他原本的生活，眼前的世界却因普拉东的善意而焕然一新，变得更加真实和牢固。普拉东以其直率、朴实、自然和充满爱心的特质，成为千千万万俄国下层农民的典型代表。他的形象不仅突显了普通民众在困境中的善良与坚韧，也通过他对皮埃尔的尊敬与关怀，反映出托尔斯泰对社会阶级和谐理想的追求，进一步深化了托尔斯泰作品中跨越阶层的团结主题。普拉东对皮埃尔的友善象征着一一种跨越阶级的联系，展现了俄国

民众在苦难中团结一致的愿景。在托尔斯泰的叙述中，这种温暖人心的互动不仅赋予了战争场景更多的人性色彩，也为读者构建了一幅理想化的阶层大团结神话。

3 《战争与和平》小说空间中的俄国新形象

在战争初期，托尔斯泰描绘了尼古拉所属的军团向波兰推进的情节，叙述中提到团里发了双饷，来了新的军官、新的士兵和新的马匹（托尔斯泰 2014：723）。但对于这些资源的来源，作者未予交代。显而易见，这些补给的背后离不开对波兰的掠夺，但在小说的叙述中，这一切被有意省略，以免破坏作品中对俄国形象的塑造。

类似的叙述策略还体现在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在立陶宛维尔纽斯的活动。托尔斯泰通过描述沙皇在维尔纽斯逗留的一个多月里，与波兰贵族举行舞会和宴会，营造出一种俄国皇帝深受当地人民欢迎的氛围。例如，一名波兰侍从武官为沙皇筹备了一场舞会，维尔诺省地主别尼生伯爵提供了郊区别墅作为场地，舞会上出现了许多波兰贵妇的身影。这些描写让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团结、和谐的帝国景象中，似乎立陶宛人民不仅没有受到殖民压迫，还与俄国人同心协力对抗外敌。然而，托尔斯泰刻意隐去的事实是，立陶宛自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后，长期处于俄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其实际的统治阶层是俄国化的波兰贵族。这些贵族为维持自身的地位，与俄国当局合作，成为俄国统治的工具。托尔斯泰的叙述忽略了立陶宛地区普通民众的真实处境，也淡化了拿破仑军队途经华沙大公国时所受到的热烈欢迎，以及波兰军人在拿破仑军队中的重要角色。这一对俄国殖民政策的过滤性叙述掩盖了波兰和立陶宛人民对俄国统治的不满，并有意突出俄国的“大帝国神话”。别尼生伯爵的“地主身份”与其郊区别墅的来源实际上深受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殖民政策的影响。然而，读者在小说中所见的，却是一个经过作者精心筛选的世界——沙皇与波兰贵族和谐共处的场景，以及俄国为民族利益而共同努力的形象。这些与小说主题相悖的历史事实被作者有意忽视，从而让作品更加契合其塑造民族记忆和帝国神话的目的。

皮埃尔继承了父亲别祖霍夫伯爵的巨额遗产，成为俄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大部分财产集中在基辅省的南方庄园，即小说中所谓的小俄罗斯地区（与俄国本土的大俄罗斯相对）。这一地区是俄国通过 1793 年与普鲁士第二次瓜分波兰王国所获得的领土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明斯克省和基辅省等，总计约 25 万平方公里。基辅省的土地来源揭示了小说背后历史的阴影，即俄国通过帝国扩张和殖民侵占所累积的财富，但这些现实被托尔斯泰刻意忽略或弱化，以便服务于民族叙事。

在分析皮埃尔的家族背景时，其父别祖霍夫伯爵的原型被推测为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重臣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Безбородко）。别兹博罗德科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外交家和贵族，其名字意为“没有胡子”，而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将其姓氏略作改动为“别祖霍夫”（Безухов 意为“没有耳朵”）。这一改动或许是为了创造虚构的叙事空间，但其象征意义和历史关联依然可见。别兹博罗德科在叶卡捷琳娜时代掌握外交大权，参与签订了《雅西和约》，完成对克里米亚汗国的吞并，并协助俄国获得南布格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土地。这些新占领的土地随后被分配给俄国贵族作为封赏，进一步奠定了他们的经济基础。

托尔斯泰借皮埃尔之手，隐晦地呈现了俄国贵族财富的殖民和掠夺背景，但对其帝国主义本质却保持沉默。小说通过虚构的姓氏和情节弱化了这段历史，使得这些掠夺行为被淡化为贵族财富的天然存在。作品有意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农奴的困苦排除在叙事之外，集中展示俄国贵族的文化和精神生活。这种选择性的叙事模式，将历史现实遮掩在华丽的文学装饰之下，为读者营造了一个“精心布置”的小说世界，让人忽略历史复杂性，而专注于作者希望表达的主题和情感。

正如，在罗斯托夫伯爵为巴格拉基昂公爵接风的宴会上，读者看得到伯爵来回奔走的忙碌身影，吩咐采办、安排冷菜、布置鲜花（托尔斯泰 2014：339），然而在这背后真正忙碌的，却是那些清扫、洗碗、料理后厨的仆役，但他们却被小说的叙事有意忽略。《战争与和平》中通过上百个人物描绘了一幅恢弘的反法战争画卷，但这幅画卷的核心依然集中于上层社会的贵族家庭。小说的主要人物几乎全是皇帝身边的贵族，然而，这些人仅代表当时俄国社会中极少数的精英阶层。而真正直面战争恐惧、承受生死威胁的，却是那些农奴、农民和平民百姓。当法军越过斯摩棱斯克时，沙皇召见贵族们，要求他们组织农奴民团。皮埃尔慷慨允诺出一千人，另一个伯爵则承诺组建一个团。然而，在贵族们随意决定农奴命运的背后，隐藏的是下层人民根本没有选择权的现实。他们被迫冲锋陷阵，为国家付出生命，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贵族可以躲到乡下庄园，带着黑奴、小丑和几十辆马车的行李远离战争，而农奴却只能沦为炮灰。在小说中，下层人民的苦难虽重，却被刻意模糊化。他们往往以一个集体符号“士兵”出现，形成一种简化的下层缩影。这些“士兵”虽谈笑风生，甚至亲切地接纳皮埃尔为“自己人”，还戏称他为“我们的老爷”（托尔斯泰 2014：886），但其个人面貌却难以分辨。小说中那些象征性展现“阶层团结”的情节，例如与娜塔莎共舞的“大叔”，实际上并非农奴，而是地主；而被认为是平民士官的杰尼索夫，他的叔叔实际上是库图佐夫将军身边的军需官。这种叙事选择虽营造出一种和谐统一的“帝国团结”图景，但也有意削弱了社会现实的张力，模糊了阶级冲突的严峻本质。

在小说的叙述中，读者很容易将当时的俄国社会生活等同于小说中展现的贵族生活。小说精心营造的空间与贵族生活方式相一致，构成了一个理想化的“新俄国社会”形象：上层与下层友好共存，各尽其职，并通过各自的方式体现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这一和谐的社会秩序在主人公们的命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娜塔莎的弟弟彼嘉和未婚夫安德烈公爵为抗击法国英勇牺牲，而哥哥尼古拉则在战后管理庄园时取得了卓越成就。“他全心全意爱我们的俄国老乡，爱他们的风俗习惯，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掌握和采用唯一富有成效的经营方式”。（托尔斯泰 2014：1261）通过这种描写，小说不仅重现了当时的历史情境，还重塑了一种理想化的民族身份认知。在这一叙事中，无论社会阶层如何划分，当外敌当前时，所有人都统一被称为“俄国人”，并因俄国战胜法国这一“大帝国”的神话所感染，展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种叙述既是对现实社会的某种反映，也是对理想化社会的一种浪漫想象。托尔斯泰以贵族阶层为核心，呈现出一种以和谐和团结为基调的民族叙事，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俄国社会在民族危机中富有凝聚力的形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想化的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社会的真实矛盾。下层人民的疾苦和矛盾被美化为“各司其职”的有序状态，而贵族阶层则被描绘成带领民族抗击外敌、恢复社会秩序的中心力量。小说所建构的这个理想化空间不仅是一种文学想象，更是一种关于民族身份和历史叙事的塑造，赋予读者对俄国社会的高度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

4 战争描述中帝国神话的建构

博罗季诺战役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部分，这场战役不仅是拿破仑战争的转折点，也是俄国民族精神得以展现的重要舞台。小说中，通过皮埃尔和安德烈等主要人物的经历，托尔斯泰刻画了战场上的混乱、死亡的残酷以及战争的悲壮。皮埃尔目睹了炮火冲天的拉耶夫斯基堡垒，而安德烈则在谢苗诺夫村被炮弹重伤。

在历史背景中，俄军统帅巴克莱·德托利（М. Б. Барклай-де-Толли）采取诱敌深入的拖延战略，不与拿破仑正面交锋。然而，这种策略在俄国内部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甚至激怒了俄国民众，认为其表现为懦弱和怯战。于是，老将库图佐夫（М. И. Кутузов）被重新启用，并在博罗季诺决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博罗季诺战役不仅是军事上的关键决策点，也是库图佐夫作为民族英雄形象得以巩固的重要时刻。托尔斯泰的叙述明显倾向于抬高库图佐夫的地

位，将其塑造成俄国精神的象征。库图佐夫的形象是一个忍耐、沉稳、精明而老练的指挥官。他的冷静和对时局的敏锐判断成为俄国军队能够抗击拿破仑的重要力量。尽管托尔斯泰在描述中也提到库图佐夫看似漫不经心，比如在军事会议上打瞌睡，但他最终总能在关键时刻做出精准的决策，从而赢得了托尔斯泰的赞扬。相比之下，巴克莱的策略尽管同样符合军事逻辑，但却因其德国血统和理性主义思维未能赢得托尔斯泰的青睐。这种偏向在安德烈和皮埃尔的交谈中尤为明显。安德烈认为巴克莱虽然判断正确，但他无法理解俄国军队和人民在保卫家园时表现出的高昂士气。他指出：“在斯摩棱斯克，他（巴克莱）的判断也很正确……但他不能理解，我们这是第一次为保卫俄国土地而战，部队里士气高昂，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托尔斯泰 2014：862）这一评价不仅反映了小说人物的观点，也展现了托尔斯泰对俄国民族精神的理想化想象。托尔斯泰通过对库图佐夫形象的塑造，将其提升为俄国人民意志的化身，体现了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的价值观。而巴克莱尽管在历史上是成功的战略家，却因不符合托尔斯泰叙述中“俄国精神”的标准而被有意淡化。这种叙述倾向强化了“大帝国神话”的历史叙事，使得博罗季诺战役成为展现俄国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记忆的重要章节。

托尔斯泰认为，库图佐夫在博罗季诺战役中的最大成就在于，他深刻理解并善于引导俄国军人精神力量的强大作用。尽管库图佐夫延续了巴克莱的拖延的军事战略，但与巴克莱不同的是，他能够赢得军队的信任，并成功激发全军的士气。战役前，库图佐夫在军前跪拜伊维尔圣母像的场景充分展现了这一点。老将军“费力的跪下来，在地上叩头……像孩子般天真地撅起嘴唇吻着神像”，这一举动引发了士兵和军官们的强烈共鸣，他们“你推我挤，气喘吁吁，脸色激动”（托尔斯泰 2014：854），纷纷效仿将军的举动。托尔斯泰写道：“他知道，决定胜负的不是总司令的命令，不是军队所处的地理位置，不是大炮的数量和杀人的数目，而是一种叫做士气的无可捉摸的力量。他留意这种力量，并竭力加以引导。”（托尔斯泰 2014：913）托尔斯泰将俄军在战役中的坚韧表现归因于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认为正是它使法军“损失了半数人马，在战斗末尾仍像战斗开始时那样屹立不动”（托尔斯泰 2014：913）。

库图佐夫的胜利也正是基于其能够引导和激发“潜藏在总司令心里的感情，潜藏在每个俄罗斯人心里的真挚感情”（托尔斯泰 2014：859），与此相对，托尔斯泰对拿破仑的评价也值得注意。他承认拿破仑在战役中指挥得当，甚至称其在博罗季诺的表现“比其他战役中更出色”（托尔斯泰 2014：915），并强调其战略部署赢得了法国及国际史学家的高度评价。托尔斯泰通过对战场激烈场景的描绘——如皮埃尔在拉耶夫斯基多面堡的经历以及安德烈的牺牲——凸显了法军在人数、火炮及装备上的巨大优势。然而，他最终将法军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俄国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

这一叙述中，托尔斯泰显然片面强调了精神力量的作用，几乎否认了军事科学在战争中的地位。这种观点反映了托尔斯泰对库图佐夫的个人魅力及其引导军队精神能力的高度推崇，同时也透露出作者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极度自豪感。然而，这种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实际的军事战略、物资保障和其他客观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使其评价更具民族主义色彩。托尔斯泰对库图佐夫和巴克莱两位将军的评判也基于这种民族主义视角，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过度强调了库图佐夫的优势，而低估了巴克莱在战争中所展现的实际能力。

对于博罗季诺战役的描写深刻地融入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叙事逻辑。托尔斯泰通过对库图佐夫的理想化塑造，以及对俄军普通士兵忠诚与牺牲精神的强调，传递了俄国民族团结与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念。他不仅意图再现 1812 年卫国战争的历史面貌，更通过浪漫化与民族化的叙事，建构了一种超越现实的俄国精神力量的理想形象。这种对历史的文学化再现，既是托尔斯泰对民族身份的表达，也是其通过艺术创作进行社会价值传播的重要体现。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详细批驳了史学家关于博罗季诺战役的若干观点，尤其针对“俄军在博罗季诺会战的地方事先设防”的传统论断进行了强烈反驳。他指出这一主张存在“尽人皆知的荒谬”（托尔斯泰 2014：844）。通过地理分析，托尔斯泰展现了俄军战略部署中的重大缺陷：两条通向莫斯科的主要路线——新斯摩棱斯克大道和旧斯摩棱斯克大道——分别由俄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防御。然而，库图佐夫的预测失误导致俄军主力集中于较易防守的新斯摩棱斯克大道，而拿破仑却选择了俄军防御较为薄弱的旧斯摩棱斯克大道，直接打击左翼的第二军团。托尔斯泰进一步指出，这种错误的战略判断不仅使俄军陷于被动，也导致了舍瓦尔季诺多面堡的迅速失守。通过皮埃尔与军官的对话，托尔斯泰再次确认了俄军高层对战役方向的错误预测。军官推测法军可能采取迂回战略，从莫斯科河右岸进攻，但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托尔斯泰不遗余力地强调俄军选址的不利条件，其目的在于突出俄国军队在绝对劣势下取得胜利的历史意义。在托尔斯泰的叙述中，博罗季诺的胜利并非依赖精确的战略部署，而是“每个士兵心里的情感”、“人人身上爱国的潜热”、“所有这些若无其事地准备为国捐躯”（托尔斯泰 2014：866）。这种情感不仅成为俄军战斗力的源泉，也使得战役结果超越了单纯军事技术的层面，成为俄国民族精神的胜利。安德烈的一句总结性评价——“谁打得狠，谁不怕牺牲，谁就会取胜”（托尔斯泰 2014：866）——更将战争的成败归因于士兵的牺牲精神和爱国热情，而非传统军事理论中的战略和装备优势。托尔斯泰通过对俄军选址错误的反复剖析与解释，凸显了俄国“精神力量”的核心作用。这种叙述在历史阐释上重塑了 1812 年战争中的俄军形象，使其超越军事失误的局限，成为国家团结和爱国主义的典范。

然而，对于博罗季诺战役中俄军阵地选择的评价，历史上也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根据托尔斯泰的观点，俄军对战场地形的错误预判及部署的不完善是战役初期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战斗开始前两天，库图佐夫在报告中向亚历山大皇帝表示：“我在博罗季诺村附近停下来的阵地……是我们在平坦地区能找到的最好的之一。”（Карл фон Клаузевиц 2019）同样，巴格拉季昂亲王（П.И. Багра́тион）在考察俄军阵地后，也致信罗斯托普钦（Ф. В. Ростопчин）说，“我们选择了所有位置，但都发现越来越差。”（Карл фон Клаузевиц 2019）这种评价显示出俄军在战略部署时已在区域范围内尽力选择相对有利的位置，战役的展开是对综合权衡的结果，而非完全的失误。另外，第六军团的高级参谋长利普兰迪上校（И. П. Липранди）的回忆录则进一步支持这一观点，他表示：“就整体而言，对于这个位置的描述，详细描述其优点和缺点……都是多余的。我只想指出一点，从查雷沃扎伊米什（Царево-Займище）到莫斯科的所有地方，没有一个位置在我们看来比博罗季诺的位置更好，尽管我们对博罗季诺有很多批评。根据总司令的考虑，必须在莫斯科之前展开战斗。”（Карл фон Клаузевиц 2019）此言表明，博罗季诺虽非理想的战斗地点，但基于战略需要和地理限制，它是最优选项。

这与托尔斯泰对阵地选址“尽人皆知的荒谬”（托尔斯泰 2014：844）的评价形成鲜明对比。托尔斯泰在叙述中更倾向于强调战役的不利条件，以突出俄军“精神力量”的决定性作用。然而，从实际军事部署角度看，库图佐夫和其指挥官们的决策是基于客观条件和战局发展的综合考量，而并非完全由失误或被动局面驱动。这种史实与文学叙述的张力不仅揭示了博罗季诺战役本身的复杂性，也体现了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赋予的价值观——对俄国精神力量的理想化呈现与对传统军事理论的批判性再思考。

5 博罗季诺战胜利的确认与大帝国文化自信

在博罗季诺战役的选址问题上，托尔斯泰的分析有其正确之处。博罗季诺村的地理位置对俄军来说确实并不理想。斯摩棱斯克到莫斯科的道路与科洛奇河（Река Колочь）并非垂直，而是先平行，后穿过河流并转向远离河流。这样，俄军左翼面临撤退困难，且敌军可以直接绕到俄军的后方，造成对撤退路线的严重威胁，这种地形对法军的进攻更加有利。同时，

博罗季诺村附近的地形复杂，低矮的小山、沟壑和低矮的树林交织在一起，战斗的胜负难以明确。无论是俄军还是法军，都难以从这些地形中获得绝对的优势。最终，这里成为了一片血腥的战场，双方伤亡惨重。据统计，在8月24日至26日的三天战斗中，双方的总伤亡人数高达66,000余人，其中俄军（包括哥萨克和游击队）阵亡约40,000人，法军死亡人数则在30,000至35,000人之间¹。这场战役创造了战争史上单日伤亡人数最多的记录，成为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战斗之一。

尽管从战术上来看，法军并未彻底歼灭俄军，俄军凭借有序的撤退成功保存了主力，确保了后续反击的可能，但从托尔斯泰的角度来看，他显然将这场战役的结果呈现为俄军的绝对胜利，尽管在客观上，法军依然在战术上取得了优越的进攻位置。托尔斯泰将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撤退直接归因于这场战役，认为这是法国崩溃的标志，“法国侵略者好像一头狂怒的野兽，在逃跑中得了致命伤，它感觉到自己得末日来临，却不能停下来，就像力量削弱一半的俄军不能退让一样……博罗季诺会战的直接后果是拿破仑无缘无故从莫斯科逃跑，沿着斯摩棱斯克故道退却；是五十万侵略军的覆灭和拿破仑法国的崩溃。”（托尔斯泰 2014: 901）然而，拿破仑撤退的决定并非单纯由战役结果决定，而是由于莫斯科的位置孤立且无法长期守卫，加之法军的补给线被切断，特别是骑兵损失惨重，迫使他必须在冬季来临之前撤退。托尔斯泰应该清楚这一点，但他却在文学叙述中美化了这一胜利。

克劳塞维茨对此提出了更为客观的评价：“博罗季诺战役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Карл фон Клаузевиц 2019）实际上这场战役并没有明确的胜利者。客观的说，在博罗季诺战役中没有任何一方取得绝对胜利，这也是历史学家和军事分析家的普遍共识²。尽管如此，在小说中，博罗季诺战役的意义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胜利，它展示了俄军的顽强抵抗，并成为俄罗斯民族自信的象征。俄军成功阻止了法国军队的进一步推进，迫使其放弃占领莫斯科，这一胜利激发了俄罗斯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团结意识，成为整个战争中不可忽视的转折点。因此，博罗季诺战役的胜利虽然没有明确的军事结果，但它在精神层面的影响不可低估。它不仅是俄罗斯人民坚定意志的体现，也是民族团结的重要象征，为接下来的抗战奠定了基础。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对博罗季诺战役的描写，确实显现出一种矛盾的叙述方式。他一方面深信俄军的胜利，将这场战役塑造成俄国精神力量的象征；另一方面，他却描写了库图佐夫与巴克莱将军在战役后对局势截然不同的判断，尤其是库图佐夫在面对战后混乱时表现出的焦虑和虚张声势。库图佐夫在听到左翼伤病成批后撤的战报后“双手颤抖，做出威胁的姿势，上气不接下气”“呼哧呼哧地喘气，敌人各方面都被打退，为此我感谢上帝和我们勇敢的军队。敌人被打败了，明天我们就要把他们赶出神圣的俄国土地”（托尔斯泰 2014: 903），这样一个看似与托尔斯泰核心观点相悖的情节，实际上揭示了作者的深刻洞察。

库图佐夫在战场上宣称胜利，即便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也反映了他对战争的独特理解。他知道，真正决定胜负的并非战场上的得失，而是战争的长远影响和士气的维系。这种策略不仅对士兵起到了鼓舞作用，也巩固了俄国上下对抗法国的决心。托尔斯泰之所以加入这一与胜利论点相悖的情节，并非要削弱俄国的胜利感，而是希望展现战争背后微妙的心理和情感层面。库图佐夫的矛盾性格和他在混乱中展现出的从容与智慧，使这个人物更加立体，也让博罗季诺战役的胜利显得更为真实可信：它既是军事和士气的胜利，也是一个民族在绝境中重燃希望的胜利。

这种矛盾可以被理解为托尔斯泰对战争本质的复杂反思。战役的胜利并非仅仅依赖军事上的优势或明确的战略结果，而更多体现在士气的稳定和信念的维系上。库图佐夫的行为虽然表面上有些自欺欺人，但实际上正是他这种“塑造胜利”的策略稳住了俄军的士气。通过让士兵和军官相信“我们胜利了”，他确保了军队在情绪和精神层面的稳定，避免了更大的崩溃。这种对心理与情感层面的刻画，使得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行动，也成为民族自我塑

造与凝聚力表达的重要场域。通过这一描写，托尔斯泰赋予博罗季诺战役以超越历史事实的象征意义，使其成为俄国精神力量的象征和民族团结的永恒纪念。

托尔斯泰的这部伟大创作完成于 19 世纪 60 年代，正如当时许多思想家一样，他也在尝试重新寻找“俄罗斯人”的身份。作为一个作家，托尔斯泰通过文学创作来重新塑造这个民族的精神面貌，而这个过程起点，是对“我是谁？”这一核心问题的深刻探问。俄国在长期的文化发展中，从法国和德国汲取了哲学、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养分，这种影响贯穿了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例如，皮埃尔的妻子海伦认为俄语词汇难以传达细腻情感而选择用法语写信；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法国女伴、军队中的德国将领，以及上流社会中的法语交流，都明确地反映了俄国与欧洲文化的深刻交融。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并未掩饰这种文化交融现象，而是坦然展现了俄罗斯文化根基的某种缺失。这种开放的态度，正是普希金时代所欠缺的。与其在文化自卑中挣扎并试图掩饰，托尔斯泰选择正视文化不足，摒弃急躁的批判情绪。小说中所流露出的，是一种基于事实的帝国自信和文化从容。这种自信不仅体现在战争的胜利上，更深植于俄国人对欧洲文化的接纳与回应中。通过小说，托尔斯泰传递出一种文化强大的信息：俄国不仅在军事上能够击败战无不胜的拿破仑，还在文化上展现出足以支撑其伟大帝国地位的自信。由此，《战争与和平》标志着俄国文化自信的初步确立，也为其展开帝国话语提供了重要经验。（汤普逊 2009：107）

6 结束语

《战争与和平》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纪实性作品，而是一部历史小说。这意味着尽管作品涉及真实的历史时间和人物，但其本质是托尔斯泰以虚构为核心进行创作的产物。以拿破仑战争时期为背景，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并非完全忠实于历史事实，而是在历史原型的基础上经过再创作，以服务于托尔斯泰的主题表达和创作意图。真实的历史背景为小说提供了宏大的叙事框架，但其中的情节与人物则反映了作者对战争、个人命运和社会生活的深刻思考。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运用了独特的叙事策略，通过对俄国国家历史的重新建构，细致标记了每一历史阶段中“自己的”（俄国民族的）与“他者的”（拿破仑法军的）对比框架。这种策略不仅为新事件和新人物的诠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强化了俄国民族身份的塑造。在小说中，托尔斯泰以俄国为叙事中心，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展现战争带来的困境、奋斗与坚韧，深刻描绘了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抉择。以虚构的角色和情节为媒介，托尔斯泰成功构建了俄国大帝国的集体记忆，表现了对祖国的忠诚与责任。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以艺术性的笔触重绘了俄国的历史画卷，在真实战争的基础上赋予了俄国民族形象以新的意义，使其成为信念的象征。通过帝国话语的塑造，托尔斯泰展现了俄国的文化自信与历史地位，强调了俄国人民在欧洲历史中的关键作用。这种叙事不仅使小说具有深刻的民族意识，还为读者提供了对战争与人性的丰富解读。

附注

1 数据来源——Napier, W. F. P.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Volume 5; Chandler, David. “The Campaigns of Napoleon.”; Duffy, Christopher. “Eagle’s Last Triumph: Napoleon’s Victory at Ligny, June 1815.”; Wawro, Geoffrey. “The Franco-Prussian War: The German Conquest of France in 1870-1871.”

2 多米尼克·拉布里（Доминик Лабри）——法国历史学家，军事分析家，著有《莫斯科 1812：战争与大火》一书；米哈伊尔·博格达诺维奇（Михаил Богданович）——俄罗斯历史学家，研究 1812 年卫国战争，并著有《博罗季诺战役历史描述》一书；卡尔·冯·克劳塞维茨（Карл фон Клаузевиц）——普鲁士将军

和军事理论家，在其著作《战争论》中研究了博罗季诺战役；理查德·库图佐夫（Ричард Кутузов）——米哈伊尔·伊拉里昂诺维奇·库图佐夫的后代，提供了关于这场战役的历史信息。

参考文献

- [1]Ключевский В. О.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Ч. II.[M]. Москва: Синодальн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1906.
- [2]Клаузевиц К. Ф. Карл Клаузевиц: 1812 год[M]. Под ред. Ильин В.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19.
<https://www.livelib.ru/book>
- [3][美]埃娃·汤普逊. 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M]. 杨德友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4][俄]列夫·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M]. 草婴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Empire Myth in *War and Peace*

Zhang Rong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Literature, as a form of artistic express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Through literary works, individuals can experience and share collective memory, thus gaining identification, understanding, and resonance. Outstanding literary works often play a key role in promoting the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Leo Tolstoy's *War and Peac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self-image of the Russian people, with its central narrative focusing on the concerns of the homeland and the reflection on the fate of the nation. The novel, with the invasion of foreign enemies and the heroic resistance of the Russian people as its main events and themes, not only faithfully reproduces war scenes and historical events but also supplements them with imaginative elements to meet the needs of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is dual narrative strategy deepens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sonance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composes the political myth of the Russian Empire. This characteristic is one of the key reasons why *War and Peace* is regarded as one of Russia's great epic novels.

Keywords: collective memory; *War and Peace*; imperial myth; Battle of Borodino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23 年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优质教学资源建设与共享项目 (d272359085)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嵘 (1982—), 辽宁沈阳人, 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文学博士, 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24-04-24

[责任编辑: 刘 锐]